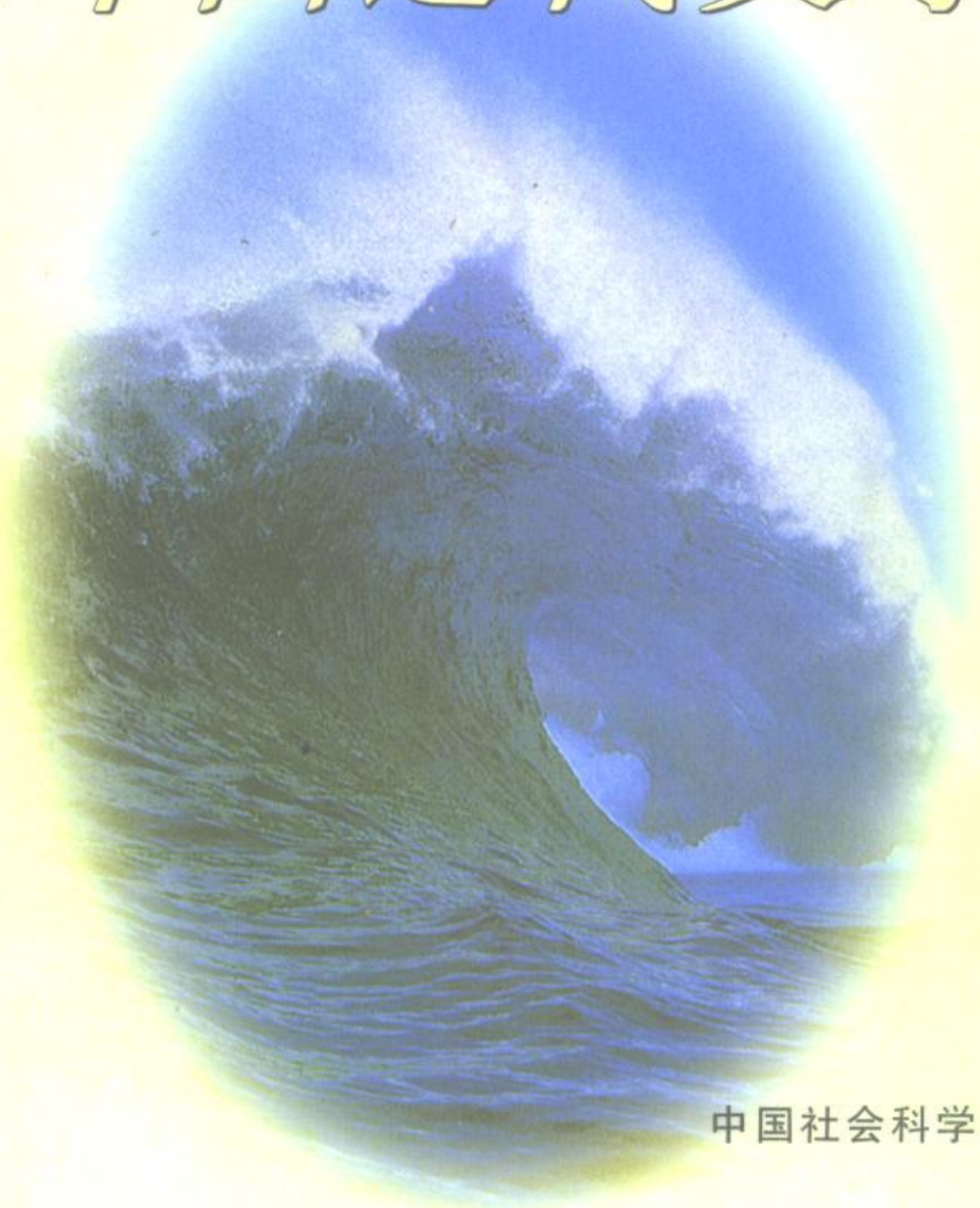


俞旦初 著

# 爱国主义 与中国近代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俞旦初 著

# 爱国主义 与中国近代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俞旦初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5

ISBN 7-5004-1875-2

I. 爱… I. 俞… III. 近代史-中国-文集 IV. K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2274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42 千字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12.70 元

# 一个勤勤恳恳和勇于探索的史学家

## ——代序言

时间过得真快，俞旦初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将近两年了。作为相知有年的一位老友，他逝世以后，我一直想写点东西寄托自己的哀思。现在曹琴华同志把旦初同志的部分遗作整理出版，约我写篇序言，我想这正好是了却自己心愿的一个机会，因此就把这个任务承担下来了。

我和旦初同志是在1954年认识的。那年夏天，他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正在筹建中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我工作的单位《历史研究》编辑部当时挂靠在历史一所。大家住在一个院内，又都是年轻人，也就时有往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待人诚恳，勤奋好学，但有时又不免有些迂阔。这个印象，几十年似乎都没有什么变化。后来，我转入历史一所，他则调至《历史研究》编辑部，我们的工作单位掉换了一个过儿。编辑部搬到近代史研究所以后，见到的机会就少了。偶有接触，知道他颇留心于史学理论的动向。再后来，听说他离开了编辑部，到近代史所从事研究工作。接着就是那场十年浩劫，他的日子比我好过一些，大概当了一阵子逍遥派。“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的来往虽不多，但每次见面，总是谈得很愉快。他告诉我，他正在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有时也把他考虑的问题和我交换意见。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记得有一次他把一个座谈会的发言稿寄给我，征求我的意见，我提了意见以后，他又打电话来，告诉我他是如何修改的。

他给人的印象有点儿迂阔，但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从国家大事到学术问题，他都有自己的见解，而有些见解又是相当深刻的。几年以前，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问题，他不但在组织生活会上，而且在给领导同志的信中，都提出了应当“扶正祛邪”的建议。他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的刻苦用功是出了名的。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和研究所的工作条件，有一个时期他吃住都在所里，连假日也很少回家。我曾经到过他的办公室，书柜顶上放着被褥，夜里他把两张办公桌拼在一起，被褥铺在上面就当床睡觉了。我知道他长期患有慢性病，劝他要注意身体。他笑着说，他的祖上是中医，他自己也懂得一些养生之道，没有问题。为了证明自己并非瞎说，他还给我传授一些饮食方面应注意的常识。谁会想到他却突然病倒，而且来不及治疗就离开了人世。有的同志说他是累死的，这话不无道理。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活得挺累，但像旦初这样刻苦勤奋，以至于伏案而死的同志，让人特别感到痛惜。

俞旦初同志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史学史。收在这本书中的文章，虽然不足以反映他的全部研究成果，却大体上可以看出他研究工作的轨迹。近代史学史是中国史研究中一个薄弱的分支学科。解放以后，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有些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人们去做。譬如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近代史学的发展是和社会思潮的激荡密切相联系的，而对这种历史联系进行深入探讨的论著似乎并不多见。在叙述近代史学的发展时，论者较多注意的是一些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的史学思想，而对于那些同样表现了一个时代的史学思潮的不著名学人的论著，却注意不够。俞旦初同志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没有停留在个别史学家史学思想的研究上，而是着重从不同侧面考察了近代史学思潮的发展。为了尽可能掌握更多的资料，

他不辞辛劳，“上穷碧落下黄泉”，从大量的报章杂志和各种书籍中，把许多一向不被学者注意又极其分散的材料挖掘出来。例如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反帝爱国史学初考》一文中，他所介绍的反帝爱国史学译著 37 种，包括翻译的 20 种，编写的 17 种，这些资料都不是随处可见而是经旦初同志细心搜集的。其中，1904 年《新白话报》“历史”专栏发表的《列强侵占中国》，第 7 期存广州中山图书馆，而第 8 期则存上海图书馆。旦初同志转请广州、上海的同志，或复制，或抄写，都经过了一番努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来，旦初同志的研究课题和他所做的工作，都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他那种勇于开拓、锲而不舍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俞旦初同志为人谦虚，他说自己的工作只是“提供有关问题的资料和线索，希望对近代史学的研究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至于系统深入的理论上的研究和评判，则有待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事实上，他所做的工作决不仅仅是提供资料。譬如有关历史研究能否成为科学，以及怎样成为科学的认识，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的观念，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曾不得不花很大力气来批判资产阶级历史学的谬误观念。但这并不等于说，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提供什么积极的研究成果。俞旦初同志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对历史和科学的关系问题的最初提出》一文中，不但介绍了 20 世纪初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早引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情况，而且考察了 19 世纪末年和 20 世纪初年中国思想学术界引进日本和西方资产阶级有关历史和科学的关系的各种论述。旦初同志认为，这些有关的论述是“当时兴起的新史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封建旧史学有批判的意义，对后来史学的发展有促进的作用”。应该说，他的这个论断是实事求是的，对于我们正确评价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历史地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且初同志的遗著中，关于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史学的文章占有很大的份量。他认为，爱国主义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思潮的一个主旋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国面临着被瓜分和亡国的严重危机。许多爱国学者痛感“亡国破家之祸，日悬于四万万人心目之间”。他们利用翻译和编纂外国有关的历史著作与资料，或是揭露外国侵略者的阴谋和野心，或是总结弱小国家被外国侵略者欺凌以至灭亡的惨痛教训；有的则宣传祖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加强乡土历史教育，以培养、增强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总之，为进行爱国主义历史教育而著史、译史和讲史，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俞且初同志当然不是把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年的中国近代史学完全归结为爱国主义史学，但他揭示了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突出地位和作用，这不仅符合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有现实意义。且初同志一向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他多次指出爱国主义史学是中国近代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调查、清理和总结，以便加以批判继承。梁启超说，“天下之盛德大业”，没有“过于爱国者”的，而史学则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秋瑾说，“凡爱国之心，人不可不有”，而“不知本国文字、历史，即不能生爱国心”。读了他们的论述，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不能不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今天，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社会上不少人对于人文科学的价值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史学工作者对于自己工作的重要意义似乎也产生了怀疑。且初同志的这本著作，将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史学的巨大社会作用，也有助于史学工作者认识史学应如何满足时代的需要，从而更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联系起来。

俞旦初同志在论述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史学时，倾注了自己炽热的爱国热情。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又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理性精神。他在肯定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史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局限性，认为在当时“爱国主义史学思潮中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情绪和大汉族主义思想是比较突出的，对汉族光荣历史传统的宣传也有过于简单而失之于盲目自大之处”。我们所需要提倡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是盲目的排外自大。在宣传我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时，我们应当具有一种宽阔的胸怀，站在时代的高度，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缺点乃至历史的黑暗面。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采取具体分析、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创造，而不致于使各种历史糟粕的沉渣乘机泛起。

中国近代史学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封建史学在近代走向衰亡，资产阶级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近代相继兴起。无论是资产阶级史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走过的道路，都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俞旦初同志所做的工作只能说是初步的。他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也未必都为同行们所同意。他曾经诚恳地表示，他的研究只是新的探索的起点，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继续加强学习，深入发掘新资料，开扩视野，使自己的认识能够不断有所前进。可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和勇于探索的史学家，在人们正期待他拿出更多的科研成果时，竟遽然病逝了。死者已矣，他没有做完的工作需要我们继续去做。如果在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领域，能出现更多的类似于或超过旦初同志的《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的优秀著作，我想这对旦初同志来说将是最好的告慰。

林甘泉

1995年元月



# 目 录

## 一个勤勤恳恳和勇于探索的史学家

——代序言 ..... 林甘泉 ( 1 )

简论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史学..... ( 1 )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 ( 44 )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 (106)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反帝爱国史学..... (150)

二十世纪初年法国大革命史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 (183)

美国独立史在近代中国的介绍和影响..... (202)

中国近代爱国主义与“亡国史鉴” ..... (242)

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英雄人物史鉴..... (260)

中国近代史学界对历史和科学的关系问题的最初提出..... (280)

后 记 ..... 曹琴华 (302)

# 简论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史学<sup>[1]</sup>

中国 19 世纪后期史学的发展趋势及其特点，大致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封建旧史学日趋衰落。特别重视当代史的研究，着重总结镇压太平天国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一些当代史的作品，突出颂扬所谓“中兴之业”和“中兴名臣”，替清政府的投降路线和外国的资本主义侵略辩护，为日益半殖民地化的封建统治服务。另一方面是：爱国学者利用外国历史资料作为揭露和反对外国侵略者斗争的工具。资产阶级改良派特别重视外国历史的研究，总结和介绍外国历史，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经验，以为中国变法图强的借鉴。初步提出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开始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为后来 20 世纪初期提出建立“新史学”的活动拉开序幕。

## 一 太平天国后对当代史的记述和总结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再一次向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卑屈求和，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把太平天国革命残酷镇压下去，建立所谓“中兴之治”。清政府中带有买办性的封建官僚集团大力开展“洋务运动”，加速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为适应封建统治的这种政治需要，为其进一步投靠外国侵略者制造舆论，陆续出现一些给汉奸卖国贼、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曾国藩之流的所谓“中兴名臣”唱赞歌，为清朝统治者的投降路线辩护、替外

国侵略者涂脂抹粉的历史著述。

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这场空前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巨大威力和深远影响，不能不使清朝统治阶级感到极大的震惊和威胁，注意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记述这场革命和镇压革命的历史过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求延续和维护受到沉重冲击和面临严重危机的封建统治。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在这近30年的长时间里，其有关记述和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著述大量出现。这种对当代历史的重视，确是中国史学史上所罕见的。

薛福成是对以上几个方面的历史都有记述和研究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所著的《庸庵文编》、《庸庵文续编》和《庸庵海外文编》，有相当一部分是论述当代历史的。当时一些学者从传统史学的角度加以评论，有的说是“得《左传》、《汉书》之神髓”，<sup>[2]</sup>有的说“是真以史汉之笔法，叙一代之要事者”。<sup>[3]</sup>

薛福成颂扬曾国藩及其集团和所谓“中兴之业”的，有《中兴叙略》<sup>[4]</sup>（1868）和《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sup>[5]</sup>（1884）。《中兴叙略》上、下两篇，集中写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成功的“中兴”史，并总结其所以能够成功的反革命经验。认为“古今盛衰之道，以才为升降”，“任之非才，则往往致败”，而“才敝则天下与之俱敝”。太平天国胜利发展时期，清朝统治者眼看太平军之“燎原”而不能阻挡，问题在于“承平既久，人既晏安，贤才日以衰息，当事者概莫之能倡，才稍稍出，而又不能用故也”。只有曾国藩起来提倡重视人才，“鼓召俊雄，参会智能”，才能完成其“中兴之业”。从这里总结出一条统治经验，这就是：有才能的统治者，必须“任群才以集事”，才可以取得大的成功；更有才能的统治者，“能得任才之才以集事”，则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功。曾国藩把有各种不同专长的文武人才罗致在自己的幕府之中，为其反革命事业忠诚效劳，所谓“幕府宾僚”，在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

罪恶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薛福成又作《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以示赞颂。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投降卖国，对内依靠中外反动势力残暴镇压革命，屠杀人民。薛福成却把他的反革命罪恶活动，作为“德”“业”，“反复称述，乐道不厌”。<sup>[6]</sup>

称颂李鸿章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功绩”的，有《书合肥伯相李公用沪平吴》<sup>[7]</sup>（1887）。薛福成把李鸿章依靠英国侵略分子戈登带领的所谓“常胜军”，“借助利器”，血腥残杀人民，向太平革命军疯狂反扑，夺取苏常，连占嘉湖，说成是什么“功济环宇”，“启中兴之运”。他还无耻地夸耀戈登这帮侵略军“精劲为诸军冠”，如果不靠洋枪洋炮，就不可能那么“勦且捷”。

其他记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历史并总结经验教训的，还有《书沔阳陆帅失陷江宁事》、《书昆明何帅失陷苏常事》<sup>[8]</sup>（1890）等。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薛福成不同意并批评“近世国史立传及私家志铭之属，意主揄扬其贤者，而摈绝其不肖者”，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要使得“关系绝大之事，后人但有所取法，无所取戒”，这是很不利的。“必有所戒，乃能有所法”。因此，他专门分别写出评述陆建瀛失陷南京和何桂清失陷苏常事两篇，说“后之任大事者皆当取以为戒”<sup>[9]</sup>。

讲两次鸦片战争历史的，有《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sup>[10]</sup>（1887）、《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sup>[11]</sup>（1890）等。薛福成在《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中说，西方资产阶级到中国来，只是“仰互市之利”，本来“颇驯不敢肆”，后来才“以禁烟肇衅”，意思是说，中国人民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和斗争，只是因为爱国主义者林则徐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的禁烟斗争挑起来的，“发难之地，实在广东”。这里明显地暴露了他为外国侵略者辩护的立场。薛福成同时还为清朝政府的屈膝投降辩护。他认为鸦片战争失败，同英国侵略者议和，是唯一的出路，说“舍此固无以弭外患”。曾经凶暴

镇压屠杀广东反英人民的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对外国侵略者，却采取实质上是投降屈服的不抵抗政策，以致广州再陷，受到人民的谴责。但薛福成却说这是他“瞻顾彷徨，进退失据，亦固其宜”。与以上完全相反，薛福成在《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中，对坚决反对求和并积极参加反抗外国侵略斗争的广东人民，则肆意加以攻击和诬蔑。广东人民严拒英国侵略者进入广州城，完全是正义的斗争。英国侵略者借口侵略广州城，薛福成虽然不得不承认也是由于“叶相一误再误”，但他首先认为这是由于广东人民斗争的“一激再激”。在他看来，英国侵略者要求“更定约章、索偿款、增商埠”是正当的，而广州之陷，以至“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都是由广东人民反入城斗争造成的，责任在广东人民一边。侵略有理，反侵略有罪。这纯粹是为外国侵略者辩护。薛福成的《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也同样充满着这种辩护之词。

薛福成除前述三种文编外，还著有《庸庵笔记》，其中有三十来篇，“记述亲见亲闻之大事”<sup>[12]</sup>，也是有关当代史事的，内容多“与文编相为表里”<sup>[13]</sup>。

这个时期，专门记述以曾国藩为头子的地主武装“湘军”及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的，先有王闿运的《湘军志》（1885）、后有王定安的《湘军记》（1889）。尽管当时和后来对它们有各种不同的评论<sup>[14]</sup>，但是其共同点是主要的、本质的。这就是“叙战绩、纪功烈”<sup>[15]</sup>，并总结镇压人民革命的经验教训。从《湘军记》可以看到，它是竭力诬蔑和攻击太平天国革命军，并讨究其为什么历时十多年才被打败的道理，赞颂曾国藩、胡林翼之流是什么“举积年锢弊廓而清之，遂以翊赞中兴，康济斯世”<sup>[16]</sup>，探求什么“万古不变”的“常胜之理”，劝戒镇压革命成功后的将士，不要“有生之乐，无死之心”<sup>[17]</sup>，不要居安忘危，以求强化反革命武装，保持封建地主阶级的江山。

专门吹捧李鸿章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有钱勳的《吴中平寇记》（1865）。

赞颂所谓“中兴景运，群公辈出”，为曾国藩、胡林翼等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一批军阀头目树碑立传的，则有朱孔彰的《中兴将帅别传》（1891）。书中把曾国藩捧到“天生圣相”的地位，说他在1870年直隶总督任内奉命查办天津教案，残害无辜人民，媚外卖国，是什么“老成至计，谋出万全”<sup>[18]</sup>。朱孔彰甚至还把华尔、戈登这帮伙同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外国侵略分子，也作为什么“中兴将帅”来立传，无耻地给他们加上什么“有劳于中国”的“殊邦烈士”<sup>[19]</sup>的桂冠，充分反映了作者的思想立场。

较早而又较系统地记述太平天国革命和镇压革命的历史的，有夏燮的《粤氛纪事》<sup>[20]</sup>（1869）。这是他继记述两次鸦片战争历史的《中西纪事》（1865）之后作的。两书内容衔接，纪事本末体裁相同，可说是当时一部中国当代史的前后编。夏燮把太平天国革命的起源，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清朝政府投降卖国的斗争，说“粤西之祸”，“实胚胎于庚子（1840）辛丑（1841）夷事之后，又乘丙午（1846）丁未（1847）阳九之厄运而起”<sup>[21]</sup>。这在同时代关于太平天国历史的著述中也是较有见地的。

夏燮在《中西纪事》中主张反对外国侵略，肯定抵抗侵略的将士，具有爱国主义思想。他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小官吏和史学家<sup>[22]</sup>，在《粤氛纪事》中对太平天国革命自然采取敌视的态度。从书中记载看，他还曾给当时镇压革命的官吏出谋献策。他对鸦片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在反侵略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有所体会，在太平天国革命中又亲身感受到人民革命的形势发展迅猛。和曾国藩军阀集团御用文人王定安的《湘军记》之类一味吹捧不同，他对清朝政府直至曾国藩的作战方略曾有不少批评指责。他对清

朝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和军心涣散也有生动的揭露，说清军内部“将不恤兵，兵不顾将，一旦有事，上惟无贿之患，下为有挟之求，其能免于弗戢自焚之祸哉！”<sup>[23]</sup>他记述太平革命军攻陷苏州时，说清朝“溃兵开门，有饱颺而远遁者，有投降而响导者”；由于清军将领腐朽无能，“兵勇内变，外寇乘暇，师不血刃，矢无遗镞”，“遂使土崩鱼烂，都会为墟”<sup>[24]</sup>。在这之前，他就预感到形势不妙，一再发出“悲夫”、“悲哉”的哀鸣，反映出封建地主阶级对伟大的农民革命风暴的惧怕。他的书写到苏常失陷后浙江“遂无安枕之日”，就没有再写下去了。

有关记述太平天国历史的，除前面这些较著名的作品外，还有很多，如署名沧浪钓徒的《劫余灰录》（1869）、储枝芙的《皖樵记实》（1888）、张曜孙的《楚寇纪略》，以及署名半窝居士的《粤寇起事纪实》<sup>[25]</sup>（1874）等。这些作品记述的内容各有不同，但它们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这就是“痛定思痛”，总结历史以为警戒。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早在1863年，王韬曾作《粤逆崖略》<sup>[26]</sup>，概要叙述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过程，分析和揭露清朝封建统治“致病之所由”，提出了变法的迫切性。在他看来，要在军事上“统数十万方张之师，覆十余年已敝之寇”，这是容易办到的，而要在政治上“拨根顾本”，“内收其民心”，真正消灭“贼”“乱”的根源，那是比较困难的。王韬认为，“天下之坏，不坏于贼，而坏于吏”，而“行法日弊，则在其人”；有人对治理国家的事情提出意见，往往“以成格拘之”，或者置之不闻不问，这同“箝人之口”没有什么两样，以致于“能言者不敢行，并能行者亦不敢言”。他进一步指出，“粉饰”（文过饰非）、“因循”（因循守旧）和“蒙蔽”（瞒上欺下）是当时“朝野内外”存在的“积习”；如果不把这些“积习”加以“变通”改革，那对封建统治来说，是很危险的。虽然王韬这里所要求的变革，没有超越封建的范围，但是

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就能够通过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揭露封建社会内部的弊病,提出改革现状的要求,这是他比同时代的史学家和思想家先进的地方。但他在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下去之后,又曾参考时人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记载,并根据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刊行书籍和西人日报,著《洪逆颠末记》<sup>[27]</sup>,通过对太平天国将领分别作传的形式,记述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自称著书的目的是要“统举贼之始末”,“尽贼之辜”,以示“贼之败灭”的必然<sup>[28]</sup>,同时也是要“纂述旧闻,用垂龟鉴”<sup>[29]</sup>。这充分说明王韬对太平天国的立场是反动的。

## 二 封建旧史学的继续和衰落

19世纪后期,清朝封建统治在政治上面临严重危机,封建史学也有走向衰落的趋势。

原来,持续十多年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封建学术文化受到猛烈的冲击。革命风暴所及,广大地区“文献荡然”,学者“转徙流离”,没有余力“自振其业”,一些著名学者也“奋志事功”,多奔仕宦之途,“更不复以学问为重”,以至造成“百学中落”的局面<sup>[30]</sup>。直到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后二十来年之久,王先谦还在那里感慨万端,悲叹革命运动对封建学术文化的极大打击,这时候仍是“困犹未苏”,还恢复不了元气<sup>[31]</sup>。这种情况在封建史学方面也有明显的反映。

曾国藩在政治上死力效忠清王朝的同时,也竭力设法拯救封建文化。他“倡设金陵、苏州、扬州、杭州、武昌书局”,“延聘儒雅,校刊群籍”<sup>[32]</sup>。以金陵书局为例,集中一些著名学者,十多年内,在史学方面只不过对一部分“正史”进行一些校勘和出版工作,没有什么新的研究和创作。

到这时候,一般对旧史文献方面的考证和校注等工作,“多已



被前人做尽”<sup>[33]</sup>。像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循乾嘉遗规”，“荟萃群言”<sup>[34]</sup>，算是给前人对《汉书》的注释作了一次清理和补充，其他比较有成绩的，已不可多见。一些学者另找做学问的途径，转而更注意于金石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企图以古器实物和古文字来考证古史问题，成为后来考古发掘、利用地下遗物证史的先导。比较著名的有吴大澂（1835—1902）和孙诒让（1848—1908）。还有的学者，利用外国史书材料来考证和补充旧史，如洪钧（1839—1893）的《元史译文证补》，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对后来借助西方史料研究元史有所贡献。

当时，有的封建学者对乾嘉考证提出非议，认为这已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深感在这“时当多故，旋乾转坤”之际，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都日益严重，没有时间再“究心于琐碎无用之物”，认为那种“不博稽诸史而搜罗金石”<sup>[35]</sup>，“徒沾沾名物器数，繁称博引”的所谓学问，对“国事人心”没有什么好处！并提出，“古人致治之法存诸经，后人致治之法存诸史”，从现在来说，“治经不如治史之尤要”<sup>[36]</sup>，而且，“史愈近者愈切实用，故国朝掌故必须讲求，明史亦须熟读”<sup>[37]</sup>。这无非是说，古代的经书、厚古薄今的学风、脱离实际的繁琐考证和金石之学，都挽救不了面临危机的封建统治，只有研究较近的历史，总结出经验教训，从中找到“致治之法”，才是一条出路。

由于清朝统治当局长时期地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学者多有戒心，一般多埋头沉溺于对旧史的校注和辑佚，而对于较近的明史和本朝史事，特别是明末清初的历史，很少人敢去作认真的研究。这种情况到晚清才有些改变。

在明史方面主要的有陈鹤的《明纪》（1871）和夏燮的《明通鉴》（1873）。陈鹤殚数十年之力，根据《明史》、《明史稿》及诸家记载，编纂《明纪》，未及成而卒，由其孙陈克家续成，认为“明之传祚，越三百年，其政治风俗，皆有可观”，希望此书对清